

不能把国企规则简单照搬到非公企业

■ 李义平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能够有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是“两个毫不动摇”, 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期间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最近, 一些有关非公经济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当前非公经济的地位与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非公经济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呢?

首先是非公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是如何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呢? 我们是通过“放开”和“开放”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萌芽, 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萌芽茁壮成长。所谓“放开”, 就是放手取消计划经济时代强加给其他经济成分的羁绊, 放手让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非公有制经济最初是在公有制经济布局相对稀缺、产业空间大, 而人民群众的生活、当地的经济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填平补齐”, 继之是随着条件的成熟, 向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层次发展, 进而成为“两个毫不动摇”有力的一翼。这方面的案例当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代表。

所谓“开放”, 就是通过独资和合资的形式吸引外商进来。这方面当以江苏、上海、广东、福建为典型代表。当然, 这些地方的非公经济的发展也非常活跃; 也可能正是非公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吸引外资的环境。非公经济

天生与市场经济相融, 它们的兴起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

有必要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当代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贡献。选择“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苏联由于公有制的程度高, 缺少非公经济发展的空间, 即使放开也难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难以形成弥补传统公有制的低效、支持改革的缓冲地带, 不得不实行“激进式”改革。中国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空间大, 放开就可以发展, 这样就形成了“渐进式”改革所必需的缓冲地带, “渐进式”改革水到渠成。

其次, 非公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促进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非公有制企业从一开始就活跃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 就是在竞争中茁壮成长。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非公经济催生了企业家, 企业家又促进了非公经济的发展, 继之又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企业家。

再次, 非公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的公有制经济, 通常表现为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的发展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

(1)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会形成“鲶鱼效应”, 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逼迫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非公企业的活力, 以及所遵循的市场规则, 使得国有企业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中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活力, 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则。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 完全是被非公企业拉下市场经济之“水”的。

(2)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目标模式, 而混合最基本的要求是两方面的

最近, 一些有关非公经济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当前非公经济的地位与发展问题。

正确认识对非公经济的改造问题

关于非公经济的发展, 有一点必须甄别, 这就是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当年之所以对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欲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 是计划经济, 并且预期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建成。

二是在诸如抗美援朝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 确实存在着少数商人的不法行为, 于是就开始了通过一定形式, 将其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非公经济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新的历史

非公经济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今日之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人民生活已从短缺走向富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

客观的事实是: 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 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据, 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 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

很大, 但情况不同, 互有交叉, 多种多样。

对民营经济的好处, 晓亮先生认为: 一是有利于藏富于民, 共同富裕; 二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有利于培养企业家; 四是有利于安排更多的人就业, 五是促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晓亮先生在 1998 年时认识。到 2008 年, 他的认识又有了创新认识, 从宏观上看, 一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源; 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三是中国就业的主渠道, 我国税收的重要来源, 地方经济的支撑点; 四是藏富于民的必由之路。从微观上说, “产权关系最清晰, 二是动力机制特别强; 三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最好; 四是分配机制机动灵活。

为了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 晓亮先生一直以社会良知和实事求是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他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他直言: “民营经济概念的好处是突出了以民为本, 突出了老百姓, 突出了民意, 突出了民间, 突出了民办、民营、民享、民主、民生、民权、民资等等。”晓亮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民营经济”概念, 就是针对有人不断反对“民营经济”, 质疑“民营经济”言论的。习近平总书

记的“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句话, 可以看出晓亮先生思考“民营经济”有坚持不懈的求实态度和一以贯之的理论勇气。

如何界定民营, 晓亮先生的看法是“私营是民营的主要组成部分; 民营可以包括私营, 但私营包括了全部民营。”现实中的民营经济大体包括: 第一大块为个体经济, 第二大块是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企业, 第三块为民营科技企业, 第四块为乡镇企业, 第五块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六块为农村专业合作社, 第七块为国有民营企业, 第八块为城市街道办的街道企业和社区所有制企业等等。(见《我的民营经济观》一文) 这些民营企业尽管数量

误的观点认为, 中国广义货币(M2)与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 2 倍, 因此存在货币超发现象, 应该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实上, M2 与 GDP 的比例并不是衡量货币数量多寡的合理指标。日本 M2 与 GDP 的比例比中国还高, 却多年来深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 从稳定总需求的视角看, 盯住通货膨胀率是比盯住 M2 与 GDP 更好的判断货币增速是否合理的指标。

2017 年中国的 M2 增速为 8.2%, 比名义 GDP 增速 11.2% 低 3 个百分点。这表明, 2017 年中国总需求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货币流通速度的提升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 M2 增速处在下降通道, 且低于名义 GDP 增速超过 2 个百分点的情况总共出现 3 次,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就业、90% 以上的新增就业。非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言, 也应当给非公经济以充分的肯定。自主创业者无一不是非公经济从业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而且创业、创新者一开始就是市场行为。世界上大多数创新, 都是市场行为下的创新。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是具有广泛参与性的万众创新。

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其民众的普遍参与程度, 取决于商业氛围。大众的积极参与, 不仅可以形成浓郁的商业氛围, 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创意涌现。这就如同一项体育活动, 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全民运动, 这个国家在该项体育活动的赛事中就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纵观世界历史, 是万众创新带来了国家繁荣。所有这些, 用我们的话语体系表达, 都是非公经济的行为。如果我们期盼万众创新, 我们就必须给非公经济以充分肯定。

应正确认识对非公经济的改造问题

关于非公经济的发展, 有一点必须甄别, 这就是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当年之所以对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欲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 是计划经济, 并且预期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建成。

二是在诸如抗美援朝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 确实存在着少数商人的不法行为, 于是就开始了通过一定形式, 将其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非公经济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认识。

首先是我们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次,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多种市场主体。据此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两翼, 长期并存或互相交叉(混合经济)。如果折其一翼, 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飞行。

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经济的企业上

另外, 关于要让非公企业里的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分享利润的说法值得推敲。

按照我们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不存在分享利润的问题, 利润是对资本的回报, 利润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作为在非公企业就业的职工, 面对的是怎样通过和企业谈判, 获得自己应得的工资和其他利益的分配。这与民主管理和分享利润没有关系, 民主管理更多的时候是国有企业的规则。大家都是共和国的主人, 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 应当推行民主管理, 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经济的企业上。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为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 “就我们德国来说, 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 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 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 使这些工业不得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 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 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 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 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李斯特的话在今天也不过时。当前, 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 我们必须为非公经济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温晓亮民营经济思想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 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的密集表态, 可以看出巩固和发展民营经济是“毫不动摇”的。

著名经济学家晓亮(1928—2012)先生的民营经济思想尚无人作过总结或系统研究, 笔者与晓亮先生交往 20 余载, 仅就接触并拜读到先生的部分论著, 作些粗浅的解读。

坚持和发展民营经济是我们立足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为了取得这样的认识, 不少理论工作者经历了曲折, 贡献了智慧, 晓亮先生无疑是贡献最突出的。晓亮先生长期致力研究民营经济问题, 有广度有深度, 特别是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科学预见和前瞻性看法, 备受民营经济界的推崇, 赢得“民营经济之父”之称, 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毫不动摇”发展民营经济的今天, 重温晓亮先生的那些弥足珍贵的民营经济思想, 我认为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

对“民营经济”这个概念, 晓亮先生自始至终反复提及。他说: “民营是个好概念”, “我是非常赞成民营这个概念的, 它突出了民间、民主的含义, 而这正是活力的源泉。”(见《寄希望于民营》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我认为‘民营’就是‘民间经营’的简称, 也可以称之为‘民办’。‘民营’是相对‘国营’

说的, 凡是‘国营’以外的都可以称之为‘民营’。它是一个表述经营主体的概念, 即由民间人士或民间组织来经营, 而不是所有制概念, 它也不是表述经营形式。所以, 民营的适用范围很宽, 但内涵却很简单。”(见《寄希望于民营》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凡不是国有国营的经济都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办的经济。”(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9 页) 晓亮先生在 2010 年 8 月 15 日为《经济学家周报》撰写的专稿《我的民营经济观》一文中说: “民营经济概念的好处是突出了以民为本, 突出了老百姓, 突出了民意, 突出了民间, 突出了民办、民营、民享、民主、民生、民权、民资等等。”晓亮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民营经济”概念, 就是针对有人不断反对“民营经济”, 质疑“民营经济”言论的。习近平总书

记的“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句话, 可以看出晓亮先生思考“民营经济”有坚持不懈的求实态度和一以贯之的理论勇气。

如何界定民营, 晓亮先生的看法是“私营是民营的主要组成部分; 民营可以包括私营, 但私营包括了全部民营。”现实中的民营经济大体包括: 第一大块为个体经济, 第二大块是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企业, 第三块为民营科技企业, 第四块为乡镇企业, 第五块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六块为农村专业合作社, 第七块为国有民营企业, 第八块为城市街道办的街道企业和社区所有制企业等等。(见《我的民营经济观》一文) 这些民营企业尽管数量

很大, 但情况不同, 互有交叉, 多种多样。对民营经济的好处, 晓亮先生认为: 一是有利于藏富于民, 共同富裕; 二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有利于培养企业家; 四是有利于安排更多的人就业, 五是促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晓亮先生在 1998 年时认识。到 2008 年, 他的认识又有了创新认识, 从宏观上看, 一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源; 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三是中国就业的主渠道, 我国税收的重要来源, 地方经济的支撑点; 四是藏富于民的必由之路。从微观上说, “产权关系最清晰, 二是动力机制特别强; 三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最好; 四是分配机制机动灵活。

为了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 晓亮先生一直以社会良知和实事求是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他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他直言: “民营经济概念的好处是突出了以民为本, 突出了老百姓, 突出了民意, 突出了民间, 突出了民办、民营、民享、民主、民生、民权、民资等等。”晓亮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民营经济”概念, 就是针对有人不断反对“民营经济”, 质疑“民营经济”言论的。习近平总书

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提供了 80% 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成就, 都印证了晓亮先生在 20 多年前对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见及其学术观点的正确性。

近年来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促进众创空间蓬勃兴起, 推动各类创新要素融合互动, 让一代“创客”的奋斗形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升级, 成为创新中国、智慧经济的重要标识。这也是激发民营经济新动能。实际上, 晓亮先生早在 2005 年就对此有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就拿民营经济来说, 创新才能不断前进, 创新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 创新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4 页)

晓亮先生说: “创业、创造、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家、企业法人、企业的所有者, 包括企业的股东职工。”(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7 页) “创新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观念、制度、机制、体制以外, 技术、经营、管理、出口、贸易、文化等等, 也要创新。我始终认为, 技术创新是重点, 体制创新是难点。”“没有创业、创造、创新, 就没有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6 页) 他进一步阐述说: “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就是推陈出新; 就是要不断地找差距, 争上游; 就是要看

到自己的不足。不论技术也好, 品牌也好, 制度也好, 用人也好, 都要有一种紧迫感。”“创新是民营经济的本质, 民营经济的活力源, 民营经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不能创新的民营经济, 就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民营经济, 它迟早会被淘汰。”(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32 页) 因此, 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民营企业。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希望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 努力实现新的发展。进入新时代, 创新再出发。晓亮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符合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发展趋势。

晓亮先生对未来中国企业发展是旗帜鲜明地“寄希望于民营”的, 他的一系列民营经济思想和创新观点闪烁着不朽的理论光芒。他在 2003 年 4 月 3 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从战略高度看民营经济发展》, 我认为他民营经济思想的集中亮点。晓亮先生指出, 民营经济的发展, 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托;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没有民营经济的参与是不行的;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他的这些超前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看, 晓亮先生的民营经济思想是非常成熟的, 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民营经济发展, 驳斥“让民营经济离场”等言论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不会陷入“滞胀”

■ 范志勇

“滞胀”这一概念的本意包含着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至少要持续较长时间, 而非经济增长率暂时性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暂时性上升。客观地说, 近期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元加息和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也给全球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总需求增速下滑和商品价格上涨压力确实存在, 但是否严重到出现“滞胀状态”状态是需要商榷的问题。

首先,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中国稳定内需尚有较大空间。总需求增速是与宏观经济政策高度相关的变量, 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实现稳定内需的目标。有一种错

分别是 1988 年、1994 年和 2017 年。其中前两次当 M2 增速显著低于名义 GDP 增速时都导致总需求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因此从稳定总需求的角度, 应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适度提升广义货币的供给速度。

其次, 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问题应高度重视, 但不应过分夸大“高杠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加剧市场负面情绪。以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问题为例, 虽然用“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的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超过美国, 但以此作为依据来判定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比美国严重, 甚至作为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依据是不合理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占 GDP 的比例为 23.1%; 而国际清算银

行数据显示 2017 年年底, 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 48.4%。假设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占 GDP 的比例整体保持稳定的话, 在减少居民消费的前提下, 中国家庭在不到 3 年时间内可以通过自身的储蓄偿还全部债务。这一点美国家庭部门是做不到的。众所周知, 美国家庭部门储蓄率之低举世闻名。2007 年底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 97.9%, 家庭和非营利组织的储蓄占 GDP 的比例不到 5%, 也就是说美国家庭在不削减消费的前提下需要近 20 年才能偿还债务。中美两国家庭部门债务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家庭部门整体上应对债务问题的能力要比美国高得多。

(下转 A4 版)